

# 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三维逻辑概论

渠长根, 成彦彦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浙江大地遍布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资源, 对今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梳理、总结并进一步弘扬生存、传承于浙江的红色文化, 不仅是严肃而宏大的学术工作, 也是红色文化自身存续与升华的价值需求。从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定性定位、学术价值和特殊意义、阶段性关注、聚焦重点难点和进路等诸多方面出发, 全面探究并回答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的三维逻辑: “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聚焦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 有助于启发、拓展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视野。

**关键词:** 浙江; 红色文化; 发展史; 三维逻辑; 概论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0) 08-0383-08

## An introduction to three-dimensional logic of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red culture in Zhejiang province

QU Changgen, CHENG Yanyan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Zhejiang province is full of rich and colorful red cultural resources, which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Sorting out, summarizing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d culture in Zhejiang is not only serious and ambitious academic work, but also a value requirement for the survival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ed culture itself. Starting from the qualitative positioning, academic value, special significance, staged attention, focus on key points, difficulties and approache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Zhejiang red culture, this paper has comprehensively explored and answered the three-dimension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Zhejiang red culture: what, why and how. Focusing on the one-hundred-year development history of Zhejiang red culture will help to inspire and expand the idea and vis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Key words:** Zhejiang; red culture; development history; three-dimensional logic; introduction

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作为全国红色文化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克时艰、谱写中华民族顽强拼搏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学界关于红色文化的起源仍有较多的分歧, 本文认同“共产党诞生标志着红色文化的产生”<sup>[1]</sup>的观点。自 1921 年红色文化生发至今, 已近百年, 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奋斗历程, 红色文化也由刚开始的精英文化逐渐转变为大众文化, 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精神: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抗日战争

收稿日期: 2020-05-09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7-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DJ007); 浙江省文化厅文化科研项目(ZW2018019)

作者简介: 渠长根(1964—), 男, 河南确山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红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研究。

时期的沂蒙精神、延安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精神,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等等;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方针、口号,尤其是“中国梦”的提出,汇聚了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文化发展的具体时代表现,集中体现了红色文化发生发展百年以来的历史主题<sup>[2]</sup>。以上种种精神和战略方针、口号的发生发展,也侧面印证和例示了红色文化的百年发展进程。尽管红色文化诞生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但学界正式提出红色文化概念的是2004年刘寿礼发表的《苏区“红色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研究》一文,并由此揭开了学界研究红色文化的序幕。

从专题立项研究的视角看,目前专门聚焦红色文化发展史的高层次项目,以赣南师范大学邱小云教授主持的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研究》和浙江理工大学渠长根教授主持的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为主。且他们各自业已有一些阶段性成果发布,尤其是构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维逻辑和厘清了主要研究范畴,比如红色文化发展史探视方法与历史分期、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构成等。

本文对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的研究,拟聚焦浙江并进行全景式专题研究,集中于“红色文化发展史”的定性定位、学术价值和特殊意义、阶段性关注、重点难点和进路等诸多方面。从“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是什么”和“为什么要研究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问题入手,审视浙江红色文化历史发展和当代境遇,界定并阐释红色文化概念与内容。再聚焦于“浙江红色文化如何发展演进”问题,以时序为主轴,从精神、制度和物质三个层面,梳理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全景描绘、展现红色文化在浙江的发展历程,以深刻了解其源流关系,准确把握其内涵,挖掘其时代价值,进一步为全国的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丰富内容,完善体系。

## 一、是什么: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定性定位

浙江是红色文化资源大省,在红色文化的创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特别的作用。以红船精神为始序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开启红色精神谱系,以革命、建设、改革一系列具体实践为历史场域的红色文化发展过程,彰显了浙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砥砺前行生动性和坚韧性。回眸、追溯、梳理百

年来浙江红色文化的发展,其要旨、主题、方向和目标清晰且明确的。

第一,浙江的红色文化发展史的学理构成与边界。

研究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需遵循并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即红色文化发展中的基本要素、一般面貌、显著脉络、阶段历程、基本经验、主要成就、历史规律、功能作用等。特别是从构成层面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为依托和基干,梳理红色文化的三大构成要素(精神、制度、物质)的发生发展。

在横向视角上,需要追踪并完成这些研究:物质层面的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历程,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历史。在纵向视角上,亟待关注并开展这些研究:围绕“百年历程”这一核心,按照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浙江红色文化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新时期的浙江红色文化。通过纵横结合、点面结合、点线结合、史论结合,以史为主,不断展开、深化浙江红色文化的变化过程及作为过程载体的各种成果。

第二,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实质与旨归。

深入研究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一方面,是为了拓展浙江革命史、党史研究的领域和空间。迄今为止由于国内一直没有产生明确定位的“红色文化”范畴<sup>[3]</sup>,温树峰等<sup>[4]</sup>提炼出革命文化、红色基因等与红色文化内涵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有关红色文化内涵的讨论一直持续在红色文化发展史的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从浙江省红色文化的构成例如红色精神、红色文化制度等出发,就某一个要素深入研究,结合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省自身特色与优势,形成了一些“史”的探索,比如红船精神发展史<sup>[5]</sup>、浙江省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特色红色小镇发展史、浙江红色人物群英谱、浙江红色物质遗存等,但是相对而言,在红色文化发展百年史框架下的红色精神研究依然缺位较多。

另一方面,是为了由点到面,聚焦、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和浙江经验。红色文化本质上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不断发展。红色文化既非自然界的先天禀赋,也非学术界的遣词造句,而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它是中华民族不甘屈辱、追求正义和光明、捍卫尊严和自由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下孕育生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凝聚成型,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嬗变升华。<sup>[6]</sup>

第三,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基本状态。

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界对红色文化投入了长时期、多领域、多角度的研究,自发与自觉相与为进、直接与间接分向共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sup>[7]</sup>。在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阶段分布上,浙江与全国的研究发展脉络并无二致。

a)1951—2001年,学界关于红色文化的探讨以精神层面为重点。1951年,钱俊瑞发表了《以革命精神贯彻新教育制度》一文,可视作这一阶段的伊始。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红色文化精神,以及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注入精神力量并发挥其一系列功能等方面,关键词主要有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在这一研究阶段中,虽然有新中国成立50周年、建党80周年等重大节庆活动和聚焦热点,但依旧没有对红色文化进行专门研究。

b)2002—2010年,学界关于红色文化的讨论以物质层面为主,精神层面为辅。2002年,谭冬发等<sup>[8]</sup>发表了《“红色资源”与扶贫开发》,表明红色文化的研究已经开始转向到另一方面。同期,国家颁布实施的《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从侧面推动了红色文化物质层面和经济价值的研究。但因现实中物质层面的开发利用商业气息渐浓,过度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反倒使其学术研究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2007年,以《恰同学少年》《亮剑》为代表的红色电视剧的兴起和瞬间燃爆的红歌会,文艺界刮起了红色旋风;同时,人们业余时间学唱红歌、看红色影视剧、游红色之旅、发红色短信、读红色经典等红色文化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一时段红色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红色文化概念、属性、特征的讨论愈发火热。关于红色文化的表现形态和特点,曾喜云<sup>[9]</sup>提出可分为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聂华瑞<sup>[10]</sup>则认为红色文化应包括物质文化、红色制度文化、红色精神文化和红色行为文化四种形态。

c)2011—2015年,学界对红色文化精神层面研究重新回归且进一步深化。就课题项目而言,该阶段相关研究部门或机构以“红色资源”或“红色文化资源”为主题,先后有9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这些红色文化主题课题立项,充分表明了国家对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的支持和学界对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关注的一种持续,且在有力扩展红色资源的研究视野、选题的多样性及多学科参与等方面也得到了印证。特别是红色文化发展史的研究参与主体越来越多样化,机构包含各种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党史业

务部门以及文献研究、史志研究、红色旅游与展陈单位等。2013年7月,在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下,教育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在复旦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全国8所高校,设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极大推动了红色文化研究,专题式研究、集群式成果、团队式发展等,迅速凸显出来。

d)2016年至今,学界聚焦红色文化的实践运用与价值体现,同时继续深化精神层面的研究。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发布的《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作为红色旅游的第三期国家级指导性文件,成为一个显著的标杆和鲜明的导向,一方面大大推进了实践领域的红色文化建设,另一方面鼓舞了学术界的投入热情。努力阐释如何把红色文化运用于人才培养、理想信念塑造、党员队伍政治素质提升、红色旅游增厚磨砺民族精神气质等领域,是以后红色文化研究的一个持续性热点。例如徐永健等<sup>[11]</sup>发表的《试论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等把红色文化契入、对接青少年培养,强调红色资源是完善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手段,突出红色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作用和功能。也是在这个时期,红色精神研究取得突出性成果,201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丛书型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读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炳林主编的导读性红色精神作品《初心——重读革命精神》。

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是继红色精神研究之后又一个学术重点,成果较多。2009年开始,中央党史研究室启动全国范围内的红色文化印记普查工作,编辑出版红色文化印记读物,配合规划部门制定红色文化印记的保护规划。全国各省市相继编绘出版了《革命遗址遗迹汇览》,分省成卷,主要聚焦于红色文化遗址遗迹,以事、物为主体,以地域为线索,同时兼及人物。另外,多地如浙江还编制了《红色足迹——浙江党史胜迹图志》《红色印记——绍兴党史要览》等。这些研究通过分类别提取红色文化现象,从横向角度扩展,实现了对红色文化百年史的点面性叙述,为线状的纵向梳理发展史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和素材。而井冈山大学编辑的以书代刊作品《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也为此凝聚了一批学者,为红色文化的发展建设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第四,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检讨与评析。

学界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展开,都无一例外地涉及到“史”的叙述,尤其是实践维度。但总体而言,对发展史的关注依然较少。如同全国性红色文化学术研究状态,浙江的研究也

未能实现突破和创新。

一方面,多样化的个案研究进一步彰显了全程性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缺失。其一,全国各地尤其是革命老区花费很多精力,无论是井冈山、延安、沂蒙山、遵义等经典红色景区,还是北京、上海、重庆等核心红色城市,聚焦自己的革命历史,甚至已经到了细微的地步,有力地完成了红色文化“点”的积累和呈现,成果显巨,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和《沂蒙精神研究》等。研究的热潮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时期: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其二,关于红色报刊史、民主革命时期的金融史、邮政史、各个根据地史等红色文化现象个案发展史研究,也是挖掘深入、成绩斐然。例如2016年丁德科等<sup>[12]</sup>发表的《红色精神百年史述论》从三大构成要素之一的精神层面,较为系统地论述红色文化百年史,信息量大、启发众多,但它仅仅是从精神要素的视角追寻百年来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启示。同样,刘浩林<sup>[13]</sup>发表的《红色资源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考察》一文,集中从资源学的角度关注了红色文化另一个构成要素——物质层面来解读其生发机制和过程、经验、启示等,给人以具体问题个案梳理深入全面的宏大感,却未能覆盖并包容另外两大基本组成部分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依然成为单一要素的发展史论。百年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缺失和薄弱,给红色文化的其它相关研究带来了诸多的制约。

另一方面,现象性、区域性的学术高度关注与整体化、系统性红色文化研究滞后同时并存。在现象性、区域性的学术研究方面,浙江对红船精神的研究,可谓是独树一帜,有较为突出的成绩,甚至还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课题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红船精神研究》)支撑。虽然红色文化的研究领域已经基本上从多个角度展开,即便是最基本的史料整理领域,但是在总体上,仍有零散、肤浅等特点。就现有专著而言,大多是红色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缺乏对红色文化深层次的理论建构和抽象总结;在论文研究方面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也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文化理论;不管是专著,还是期刊论文,都没有立足红色文化的整体对某一区域做全景式描绘。因此,在区域性红色文化的研究上,亟待一批有影响力的专著和论文出版。同时,红色人物研究成果丰富,但是横向贯穿和名下集群<sup>①</sup>能力依然薄弱。缔造、承载、发展红色文化的红

色人物,无论是领袖、先驱、模范、英烈,还是在军事斗争、隐蔽战线、国防建设、科教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也包括隶属其他党派的红色人物,他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留下了浩瀚的文化印记和遗存。<sup>[14]</sup>因此,在像《党史人物名录》《星火之火》《红旗飘飘》等个人传记重大题材中,以人物为主线的红色文化内容的梳理都得到了诸多拓展深化且有了丰富的成果,特别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系列型《中共党史人物传》,内容丰富且翔实,成为党史视角下人物研究的力作,并且一直发挥着工具书、参考书的价值。但这些成果中因选取的人物过于严格和高规格,相对缺少广泛性和覆盖面,又因叙述方式主要是人物小传,所以缺乏相对深度和某个具体人物相关的文化现象的集群能力。相应地,以红色人物印记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研究,则可以更加全面地包容多姿多彩的人物。在红色人物印记研究上,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研究团队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他们于2014年编撰并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红色名人印迹》一书,覆盖全国、横贯五四运动以来印记视角下的红色人物,并对红色人物的研究做了进一步拓展。<sup>[15]</sup>

## 二、为什么: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特殊意义

深入研究红色文化发展史,探索规律、启示当下、烛照未来、实现创新,对弘扬红色文化、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中国梦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一,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学术价值显著。

首先,有利于弥补红色文化发展通史的缺憾。以通史的气度和格局,研究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历史,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通史”可以理解为贯通的历史,即国家或地区的初始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历史,其叙述内容几乎囊括所有事件和研究课题,但并不深入。与断代史研究相比较,通史是跨代式研究,不间断地记述自古至今的历史事件。通史在现代史学上就是“大历史观”,而断代史则限于某个时代。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红色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始一步步地生发、建构、扩充、发展起来。这个过程目前还在继续中,而且气势更加恢宏,成就更加沛然,影响更加深远。因此,浙江红色文化学术

① 同一个人物相关的所有红色文化资源的汇聚。

的跟进,成为学界的当务之急和刻不容缓之事。

其次,有利于建构浙江红色文化发展的历史观和历史坐标,为深度研究提供历史脉络。客观而论,全国红色文化研究可谓有声有色,从参与的主体、涉及的内容、成果的呈现方式、社会影响力、民众关注热情等诸多方面看,红色文化尽管远远没有达到显学的高度,但显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尤其在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状态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出于历史责任感和学术尊严,也出于对共和国创建发展艰难而光辉历程的尊重,开始把红色文化研究推向前台。特别不能淡忘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更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红色文化的学术投入,注入了强有力的现实引力。因此,各种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研究机构、民间研究社团、成果展示平台等应运而生,如教育部牵头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中宣部牵头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纪委、监察部牵头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国家旅游局牵头的“经典红色文化旅游线路”,老干部、老将军和老战士聚集在一起成立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和“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院”,以书代刊的红色文化出版物《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专业性学术期刊《红色文化学刊》,红色文化网、中国红色文化旅游网等。它们与传统立足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机构一起,成为推进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要力量。继续发挥上述学术团队或平台业已凝聚起来的力量,认真研究百年来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在全国上下学习研究红色文化的大背景下,浙江充分挖掘并运用了红色资源。例如“红船精神”重铸信念之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浙江理工大学在全国率先创办了“红色文化研究”硕士学位点<sup>[16]</sup>,并在2018年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红色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该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框架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维度和巨大空间着手,较为系统地开始红色文化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这个创新事实上把遍布全国的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学术自觉提升到了学科自觉的高度,相信会对红色文化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再次,有利于拓展浙江革命文化、党史文化的研究宽度,并且在资政育人方面发挥作用。如今党中央提出要实现党史文化的“资政育人”功效,红色文化不仅不能靠边站,也不能落后。红色文化资政育人,首先要有一个系统而明确的发展史的叙述表达,需要清晰地告诉人们,告诉被“资”的政治及其人员、

被“育”的人,给他们生动而全面的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图式、话语系统,引导他们建构起对于红色文化的历史感、庄重感和敬畏感,自觉把红色精神融入自己的心灵世界,把制度层面的红色文化变成人生进步的参照、单位治理的历史素材、参与社会管理的历史依据,把物质层面的红色文化变成生活、学习、工作和进步的动力汲取地和文化财富获取地。<sup>[17]</sup>

最后,有利于发挥红色文化的基础作用。在党史的范畴内,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是有目共睹且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平台搭建、成果展示、活动拓展等每个方面和环节,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员队伍,令人信心满满,其成果更是令人敬佩。但相对而言,作为包容党史文化外延更大的红色文化,基本上还是处于民间自发的状态。尽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反复倡导,但似乎仍然没有上升到集体自觉的高度。在此背景下,花大气力做好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史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一定会反过来推进党史文化的深入研究。

第二,从红色人物印迹看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特殊意义。

首先,有利于构建以红色人物为纲的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印迹资源库。浙江红色人物印迹研究,一方面,能够为浙江红色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一种新的内容和手法以及新的载体,例如向浙江省纪念馆提供更丰富多样的红色人物印记信息,进而增厚馆藏和展品。另一方面,可创新现有纪念场馆在布展、收藏时的一贯格局和体例,构建一个以人名而集群的文化现象展览收藏手法和资源库。同样,研究浙江红色人物印迹,可以为党史部门的学术研究、文博保护开发,提供新的参考和襄助。

其次,有利于浙江红色文化的精神弘扬、资政育人等社会功能实现。各种各样的红色人物印记,以促进革命历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发掘与展示为动力,将更加促使红色文化发挥出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正能量;也将大大有利于进一步发掘红色人物的社会、历史影响和文化价值,并通过红色人物印记这一载体彰显、释放红色人物的精神和魅力,从而生动、具象化红色文化历史内涵,为当下及未来的红色文化建设增添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空间。

再次,有利于对省内红色印迹的保护和利用。由于历史越来越久远、当事人越来越走出现实,红色人物印记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财富客观上面临着悄然流失的境遇。例如回忆失真、缺乏旁证互证,记载不详、记忆泛化,保护乏力或开发混乱等。因此,加

大力度进行学术整理不仅会促进红色印迹的相应保护、开发和传承,而且对于一些红色资源还具有抢救性的作用。在城镇化和农村大开发的同时,对红色遗址遗迹的补救和保护遇到了诸多的挑战,需要及时有力地措施和有效的应对。

最后,宏观上研究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也有利于促进浙江红色旅游产业的新发展。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的研究可为浙江红色旅游产业部门提供一个全景式史学叙述模式,为各地旅游管理机构战略规划当地旅游业提供决策参考。旅游是一种全民性的参与方式,具有最大的社会互动性,也有最直接和生动的文化体验和吸收功能。系统、完整、形象的红色文化史呈现与表达,客观上会增加游客的游赏兴趣,从而潜移默化地传递、释放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 三、怎么办:坚持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阶段性关注、聚焦重点难点和进路

针对红色文化研究中整体化、系统性研究滞后,现象性、区域性的学术高度关注,全景式和整体性构建亟待加强等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依托为线索,从红色文化的三大构成要素(精神、物质、制度)入手,并紧紧围绕这三个方面,从浙江红色文化史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纵横结合、史论结合以史为主,总结、展示浙江红色文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全面的发展图景,厘清百年来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历程的基本追求,并由此努力建构一个浙江红色文化的史学叙述体系。这是一项庄重的学术责任,也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课题陈设。

第一,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坚持阶段性关注与总体蓝图描述相统一。

从生成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培育、发展、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深层内因则是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奋斗创造。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孕育、传承、弘扬了最先进的红色文化,而红色文化又支撑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铸就辉煌。因此,聚焦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真实性。浙江红色文化史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脉络,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时期<sup>[18]</sup>,这些时期前后相继,次第深入,红色文化越来越明晰和丰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的红色文化创建时期,也是浙江红色文化的创建时期。这一时期浙

江红色文化发展历程具体可以再细分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的浙江红色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的浙江红色文化、土地革命风暴中的浙江红色文化、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浙江红色文化、解放战争时期的浙江红色文化。这一时期浙江孕育出了红船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等开新河、领风骚的精神。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是中国红色文化在全面自觉状态下凝结成型期。对应此时期,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历程具体可以再细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浙江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浙江红色文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浙江红色文化、历史转折时期的浙江红色文化。这一时期浙江产生了一江山精神、大陈岛垦荒精神、海霞精神和蚂蚁岛精神等熠熠生辉的精神。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红色文化在承前启后中不断演进、升华和创新发展的时期。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红色精神、红色物质、红色制度继续发展,新成果不断涌现之外,还有两个重大特征。其一,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红色旅游产业快速、全面发展,浙江趁着改革的东风使其红色文化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网络数字媒体的发展,红色文化相关网络信息资源等也开始大量呈现。其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度发展,不断创新,成为红色文化发展最显著的成果和最雄厚的动力。尤其是浙江继成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之后,还成为了“改革开放先行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在社会治理、区域发展上,探索并贡献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并提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例如特色小镇、最多跑一次改革、美丽乡村、两山理论、五水共治、河长制等等。这些成果为红色文化增添了具有浙江特色的新内容、新成果和新价值。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的构成和存在方式发生了新的嬗变和升华,红色文化的资源属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和释放。

第二,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必须聚焦关键点和制约性难点。

一方面是关键点问题。对于百年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的研究而言,准确界定和科学阐释红色文化的科学内涵是基础性工作。其一,必须借助全国的学术进展,努力从多视角、多层面对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历史进行梳理和分析,尤其是要描绘出浙江红色

文化百年图景,努力建构一个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历程的叙述系统。其二,要做到通史全景式展现浙江红色文化发展百年历程。针对浙江红色文化史研究现状以及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史研究时间跨度大、涵盖内容广的重点难点问题,立足史实,放眼全局,科学编织红色文化发展经纬,以时间演进为纵轴,以精神、制度和物质三大层面和领域的红色文化创建、传播、发展为横面,纲举目张,系统梳理;坚持“纵横结合”“史论结合”“点面结合”,以通史全景式的历史叙述方法来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红色文化的发展状况,准确判断历史形势、科学把握历史脉络,致力构建红色文化的“总画面”、深度阐释红色文化的“运动与变革”,发现和掌握浙江红色文化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演变轨迹,填补浙江红色文化通史性和整体性研究空白。例如,可以继续从五四运动以来浙江籍进步人士与进步报刊研究、创党建党人物研究、全面改革开放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探索等具有代表性的方面,聚精会神,多出成果,展现历史真貌,凝练精神品质,助力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是制约性难点问题,也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的梳理是否全面翔实恰当。这不仅是一个理念性问题,更是一个决定史的解说是否成立的基础性问题。百年发展史,综合性强、理论要求高、学科跨度大,涉及到红色文化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与概括,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历史的梳理与分析,新时期培育和践行红色文化的基本原则、基本机制及现实路径等一系列内容。如果不能建构起一个令人信服或者足以自圆其说的历史叙述体系,接下来的研究将如同沙堆上建塔。其二,如何有机结合精神、制度和物质三个层面研讨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史,并按照一定的逻辑展开清晰的叙述。

第三,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必须有一个明确而可行的进路。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着“浙江百年历程”这个核心,以时间推进为主轴,按照“导向正确、史实准确、文字生动、细节典型、点评精当、针对性强以及注重创新”原则,全面梳理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历程,系统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sup>[19]</sup>浙江红色文化基本内涵、推进条件、发

展逻辑及历史经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坚持和实践,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入浙江的进程与方位、状态与成果。

一方面,从学理视角来看。以丰富的浙江红色文化文献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现存研究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革命与建设、改革的关系”“红色文化整体与具体红色文化形态个体的关系”,系统分析红色文化与先进文化、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等的关系,以宏阔的视野、理性的分析全面阐释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历史进程,准确凝练总结浙江红色文化百年发展经验与教训,并对浙江红色文化未来发展提出合理构想。

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看。树立“总画面”和“运动变化”的观念,以时间推进为轴,以各时期浙江红色文化基本内涵的阐释和分析为主线,以通史全景式的历史叙述方法全面考察三个历史阶段浙江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科学找寻浙江红色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规律,致力构建浙江红色文化的“总画面”,全面把握和系统展示浙江红色文化百年灿烂与辉煌,呈现一部浙江红色文化“史诗性大片”。

#### 四、结 语

对于浙江这个拥有红色文化资源的“富矿”,只有从更深层次上挖掘研究,才能将浙江红色文化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等层面的价值呈现在世人面前。尽管近年来学界在对浙江红色文化与全国红色文化的发展脉络研究方面都进行了长时期、多角度的研讨,并形成了累累硕果,但在针对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的专门研究还存在欠缺。因此亟待一批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上进一步聚拢起来,投入关切和精力,协同开发浙江这座红色文化资源的“富矿”。当然,在研究的同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包括学理方面的欠缺,比如发展通史的缺失,历史脉络构建不稳,浙江革命文化、党史文化的宽度不够、融合有隙等问题。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坚持阶段性关注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蓝图;第二,聚焦关键点和紧要处;第三,清晰明确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的进路。也只有全面兼顾这些方面,才能构建浙江省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的完整三维逻辑,叙述并呈现出丰满而绵长的百年浙江红色文化发展史,进而助力当下与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并切实在借助全国学术力量的基础上,致力于在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领域尝试发挥“重要窗口”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渠长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语境下的红色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12:379.
- [2] 邱小云.论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J].红色文化学刊,2017(2):29-35.
- [3] 渠长根.学习习近平关于红色文化的重要论述[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09,5(2):27-35.
- [4] 温树峰,吴瑾菁.2000年以来的红色文化研究综述[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0(6):641-647.
- [5] 陈瑶,汪娟.嘉兴红船独特的红色文化[J].科技视界,2019(13):237-238.
- [6] 渠长根.红色文化学科建设刍议[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7,3(2):1-7.
- [7] 黄三生.国内红色文化研究的简要回顾与展望[J].文化软实力,2017,2(2):40-45.
- [8] 谭冬发,吴小斌.“红色资源”与扶贫开发[J].老区建设,2002(7):44-45.
- [9] 曾喜云.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 [10] 聂华瑞.论“红色文化”的功能[D].新乡:河南师范大学,2013.
- [11] 徐永健,李盼.试论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J].思想教育研究,2016(12):84-88.
- [12] 丁德科,王昌民.红色精神百年史述论[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31(20):5-30.
- [13] 刘浩林.红色资源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考察[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5,1(1):12-18.
- [14] 渠长根.基于人物印迹的党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刍议[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5(2):31-35.
- [15] 蒋颖莹.基于名人印迹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18.
- [16] 红色文化网.全国首届“红色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EB/OL].(2018-05-24)[2020-04-15].<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china/ideal/2018-05-24/170859.html>.
- [17] 华正学.试论思政课实践教学与浙江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融合[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7(6):33-36.
- [18] 余广寿.认真学习党史 领悟主题教育:重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J].民办高等教育研究,2020,17(1):85-89.
- [19] 冯旺舟.革命的需求与力量的整合:安德烈·高兹的革命型政党理论评析[J].教学与研究,2020(5):65-73.

(责任编辑:唐志荣)